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試析江澤民芬、匈、德三國之行的背景和意義

doi:10.30390/ISC.199508_34(8).0002

問題與研究, 34(8), 1995

Wenti Yu Yanjiu, 34(8), 1995

作者/Author：洪茂雄

頁數/Page：13-2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5/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08_34\(8\).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08_34(8).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試析江澤民芬、匈、德 三國之行的背景和意義

洪 茂 雄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壹、前 言

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江澤民於今(一九九五)年七月五日至十五日分別出訪北歐的芬蘭、東歐的匈牙利和西歐的德國等三國。

這三個歐洲國家，各有其特色。芬蘭在東西方冷戰時期因其與前蘇聯毗鄰，使赫爾辛基政府的對外政策格外小心謹慎，既不靠攏莫斯科，也不與西方國家結盟。在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夾縫中，謀求發展，確保國家利益和獨立自主。直到蘇聯瓦解，冷戰落幕，芬蘭始調整方向，積極參與歐洲主流社會，於一九九五年一月正式加入歐洲聯盟。匈牙利在共黨長期統治時，曾推展所謂的「新經濟機制」改革模式，而備受各方矚目。惟推行近二十年，仍難有重大突破。一九八九年匈共採取果斷行動，毅然決然放棄馬列主義，與過去歷史劃清界線，改頭換面，奉行民主政治，為社會主義國家樹立劃時代的變革典範，令世人刮目相看。至於德國，本來其經濟實力就表現不凡。一九九〇年十月，東西德和平統一後，雖然對德東地區的重建承擔沉重的財政負荷，但已擺脫困境。目前，德國的經濟發展又呈現活力，不但將扮演歐洲經濟復甦的「火車頭」角色，而且還躍躍欲試，爭取聯合國改組後安理會新的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以提升其國際聲望和影響力。

江澤民這次歐洲之行，很巧的是，都是中共與芬蘭、匈牙利和德國建交以來，第一位國家元首進行正式的國事訪問。為此，本文探討的主旨，試以瞭解，江澤民何以選擇此時此際出訪這三個歐洲國家，其背景與目的安在？江氏此趟芬、匈、德之旅究竟顯示那些意義？其所獲得成果，以及可能影響為何？因江澤民此次歐洲三國之旅，正逢華府與北京關係低潮，和我國推動「務實外交」有重大突破之際，江氏在國外的言行舉止，也頗能反映當前中共的對外策略，故甚值國人關注。

貳、江澤民訪問芬、匈、德三國之背景

一、現階段雙邊之互動關係

中共與芬、匈、德三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基本上可從雙邊簽訂的合作協定等官方

文件、經貿關係和高層互訪情形等三個指標洞察其概況。

芬蘭於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八日與中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是第一批承認北京政府的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之一。目前，中（共）芬雙邊簽訂有：雙邊年度貿易協定和支付協定、航空協定、海運協定、經濟工業和科技合作協定、文化協定和投資保護協定、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稅漏稅的協定、開發信貸協定和科技合作協定等^①。

匈牙利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追隨蘇聯承認中共政權。六〇年代中蘇共交惡，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北京與莫斯科的關係呈現冰凍狀態。此時，布達佩斯政府站在莫斯科這一邊，與中共的關係甚為冷淡。直到九〇年代，中（共）匈之間的關係始逐漸恢復正常化。目前雙方所簽訂的官方文件計有：中（共）匈兩國關於到二千年經濟和科技長期合作基本方向的協定及為期五年的中匈文化、科學、教育合作協定；避免雙重稅收協定並草簽航空協定等。^②

至於德國，在統一前，東德率先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與中共建交；西德則於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始和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在東西德分裂期間，東德基於安全因素，一直「一面倒」向莫斯科，致使北京當局反而與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別甚大的西德關係密切，而與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東德卻很疏遠。德國統一後，中共與德國的關係，基本上延續了波昂與北京過去所建立的基礎。目前簽訂的雙邊重要文件計有：海運協定、民航協定、科技合作協定、經濟合作協定、衛生合作協定、技術合作協定、投資保護協定、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避免雙重徵稅協定、財政合作協定、商標互惠協議、內河航運協議、兩國外交部建立磋商制度的議定書等。^③

在雙邊高層互訪和經貿關係方面，芬蘭總理索爾薩（Kalevi Sorsa）和總統科伊維斯托（Mauno Koivisto），分別於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八年訪問北京。這是中（共）芬建交以來，芬蘭政府首長和國家元首首次到中國大陸訪問。芬蘭現任總統阿赫蒂薩里（Marti Ahtisaari）也將在明（一九九六）年四月，應邀進行國事訪問。匈牙利總統根茨（Árpád Göncz）、德國總統赫爾佐格（Roman Herzog）均在去（一九九四）年到訪過中國大陸。中共總理李鵬則於去（一九九四）年七月到訪過德國，而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亦將在今秋第四度走訪中國大陸。至於近年來經貿關係，中共與芬、匈、德近年來的貿易關係已有顯著增長（參見附表）。一九九四年中國大陸與芬蘭、匈牙利的貿易額已增加到四億多美元，與德國的貿易額則為一百一十八億九千八百萬美元，德國是中國大陸和歐洲國家最大貿易伙伴。截至目前為止，德國在大陸實際投資金額為六億一千八百萬美元，芬蘭也有九千餘萬美元，^④匈牙利經濟正在轉軌階段，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則呈現逆差，正圖謀也能在中國大陸爭取某些工程，來平衡其國際收支。

註① 世界知識年鑒一九九三～九四年（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頁四七四。

註② 同註①，頁五五三。

註③ 同註①，頁四四九。

註④ 台灣時報，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十三日，版七；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五年七月六日，版A2。

中共與芬、匈、德貿易狀況表

單位：萬美元

| 年代 國家 | 1990 | | | 1991 | | | 1992 | | | 1993 | | | 1994 |
|----------|---------|---------|---------|---------|---------|---------|---------|---------|---------|---------|---------|-----------|-----------|
| | 進口 | 出口 | 總額 | 進口 | 出口 | 總額 | 進口 | 出口 | 總額 | 進口 | 出口 | 總額 | 總額 |
| 德國 | 293,671 | 203,439 | 497,110 | 304,872 | 235,559 | 540,431 | 402,300 | 244,800 | 647,100 | 630,979 | 396,846 | 1,000,825 | 1,189,800 |
| 匈牙利 | 11,975 | 2,388 | 14,345 | 3,540 | 2,020 | 5,560 | 1,889 | 4,500 | 6,389 | 6,191 | 16,502 | 22,693 | |
| 芬蘭 | | | | | | | 25,230 | 9,263 | 34,493 | 32,237 | 10,360 | 42,597 | |

資料來源：根據相關資料整理

準此以觀，現階段中共與芬、匈、德三國之關係，相當具有代表性，正反映北京政府積極對歐洲伸展其影響力。

二、江澤民出訪的目的

江澤民此次歐洲之行，選定北歐的芬蘭、東歐的匈牙利和西歐的德國，除了刻意安排彼此建交以來第一位中共國家元首到訪的紀錄外，還考量到下列因素：其一，芬蘭的對外政策，戰後以來一直奉行中立主義。當西方國家對中共鎮壓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不約而同進行經濟制裁或外交抵制時，赫爾辛基政府並未參與，仍與北京維持良好關係；其二，中共對匈牙利別有獨鍾，對其六〇年代末期所推動的「新經濟機制」改革模式，有諸多師承之處。再者，匈牙利政界忙於政爭，對中共迫害人權的勾當，無暇他顧，沒有像波蘭和捷克的政治人物那麼關切，使得北京與布達佩斯之間的關係發展沒有障礙；其三，德國是中共與歐洲國家經貿關係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北京加強與波昂的政經關係，一方面可經由德國，增強其對歐洲聯盟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可藉經濟利益的拉攏，以牽制來自美國的壓力；其四，正當中共（共）美關係陷入低潮之際，北京當局可運用江氏的歐洲之行，大作文章，顯示其對歐洲的重視，多少也可以沖淡北京與華府之間的緊張。

綜觀江澤民以第一位中共國家元首之尊，出訪芬、匈、德三個歐洲國家，其目的昭然若揭，不外乎是：

第一，**加強雙邊互動關係**：江澤民本次歐洲之行，均在公開場合強調，希望經由芬、匈、德三國的「國事訪問」，可以「進一步增進相互瞭解與合作，推動雙邊關係向更高水平發展。」^⑤

第二，**透過經濟合作的緊密關係，俾擴大中共對歐洲的影響力**：很明顯地，江澤民的歐洲之行特別突顯其經濟目的，尤其能夠洞察波昂政府經濟利益和外交利益的需求，在中（共）美、中（共）英關係陷入低迷之際，施以經濟大餅之惠，拉攏德國，既可憑藉深具吸引力的龐大市場，提升其在國際地位的重要性，亦可表明其對美、英等國不友好行動的懲罰。

註⑤ 國防部情報局編，中共廣播輯要（台北），一九九五年七月六日，頁廣十三。

第三，提高江氏的國際形象和地位：在後鄧時期，江澤民的領導地位基本上已成定局。江某為顯示其權力已牢牢掌握，藉著出國訪問不但可提高其國際聲望，而且也可向國際社會傳遞他是後鄧時期實際掌握大權領導人的訊息。

第四，外交禮儀上的回訪：芬、匈、德三國的國家元首均先後到訪過中國大陸。過去，由於中共政局不穩，權力接班並不順利，使得中共最高領導人必須坐鎮北京，以掌控權力中心，因此出國進行「國事訪問」的頻率減少許多。現在江氏的領導地位更形鞏固，在國際社會拋頭露面乃有其必要性。

叁、江澤民歐洲之行的重要性

一、主要參觀活動內容

江澤民此次芬、匈、德三國之行，除了例行性的外交拜會活動和順道瀏覽名勝古蹟外，他選擇性的參觀活動，多少能反映中共對芬、匈、德的企圖所在。因此，江澤民的主要參觀活動，也頗值觀察。

江澤民在芬蘭和匈牙利的訪問行程較為單純，畢竟芬、匈兩國算是中小型國家，儘管有相當的工業基礎，但其經濟條件還是不能與工業先進的德國相提並論。因此，江氏此次歐洲之行，重點還是擺在德國。

由於芬蘭的閃爍煉銅廠是屬於著名的跨國金屬集團——奧托昆普（Otto Kunpu）公司所有，其業務遍及世界。其中以「閃爍熔煉工藝」的發明著稱，目前世界上約有百分之五十的銅生產採用其技術。如中國大陸江西、甘肅、安徽等地的製銅企業均與該公司有技術合作。一九九四年九月，奧托昆普公司特在北京成立代表處。基此，江澤民特別由芬蘭總統阿赫蒂薩里陪同，飛往該公司所在地波里市參觀，據江氏表示，他對該公司的先進技術，印象極為深刻。^⑥顯然地，中共也正在積極開發有色金屬，亟需引進外資和技術。

至於江澤民到德國的訪問行程，他的第一站即是德國工業大城史圖加特（Stuttgart），也是舉世聞名高級汽車「賓士」（Daimler—Benz AG，中國大陸譯為「奔馳」）公司的所在地。其主要目的當然是中共已和德國談好了一筆可觀的生意，即賓士汽車公司將和中國大陸的南方汽車公司合資興建價值達十億美元的汽車製造廠，可年產六萬輛麵包型高級汽車和十萬個汽車引擎。同時，因「賓士集團」除了生產高級轎車外，還在航空航天和鐵路運輸等部門有新的發展，正積極打入中國大陸市場。為此，賓士總公司特別安排江澤民搭乘由該公司參與發展的德國高速鐵路從史圖加特到波昂這一段路程，希望能爭取到從北京至上海高速鐵路的建造工程，得以使這段長達十七小時行程，縮短為七個小時。^⑦此外，德國另一個工業集團——「西門子」（

註⑥ 國防部情報局編，中共廣播輯要（台北），一九九五年七月八日，頁廣十六。

註⑦ *Süddeutsche Zeitung*, July 12, 1995, pp. 1~3.

Siemens），也是中共的重要客戶，已在中國大陸投資多筆企業和建造地下鐵工程。西門子公司正和山東電力局、四川東方電器集公司，洽商建造火力發電廠和有關電器生產的合資企業。^⑧因此，在江澤民準備離開德國之前的最後一站，即在慕尼黑由西門子總公司接待，並完成草簽。座落在慕尼黑的寶馬汽車公司（BMW AG）和奧迪汽車（Audi）公司也不錯過江氏來訪的機會，展現其汽車製造的先進技術和氣派。奧迪汽車是大眾汽車公司（Volkswagen AG）的子公司，和大陸第一汽車公司有合作，是目前中共高幹普遍使用的高級交通工具，早已人盡皆知。德國汽車工業顯然已在中國大陸「落地生根」，大眾汽車公司早在十多年前進軍大陸市場，供不應求，占有相當高生產比例。如今以品牌著稱的賓士汽車公司乘勢跟進，也將在中國大陸擁有一席之地。看來，德國汽車工業不但捷足先登亞洲這塊龐大市場，獲利非淺，而且也可望帶動中國大陸的工業發展。

二、政策性的演說要點

在江澤民這次訪歐行程中，也難免會在公開場合發表談話，或接受大眾傳播媒體記者的採訪，表達當前中共的對歐政策，或其個人對世局的看法。比較受到關注的政策性談話，分別在布達佩斯和波昂有感而發，頗值得在此歸納其要點。

首先，江澤民於七月十日在匈牙利總統根茨的歡迎晚宴中，首次提到，北京當局與中、東歐國家發展長期的友好互利合作關係的五項原則：^⑨

第一，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不干涉別國內政。中共歷來主張，選擇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發展道路和模式，完全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別國無權干涉。

第二，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一視同仁地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差異不應成為發展國家關係的障礙。

第三，中共和中、東歐國家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北京當局表示，與中、東歐各國發展關係絕不針對第三國，完全基於實現共同繁榮、促進歐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的目標。

第四，根據平等互利原則擴大雙邊的經貿合作，促進彼此經濟的發展，以造福於各自國家的人民。

第五，真誠希望中、東歐地區穩定，各國人民友好和睦相處，支持和平解決相互之間的爭端，尊重和支持本地區國家加強區域性合作的願望。

事實上，江澤民所提到的這五項原則，並無新意，尤其第二和第五兩項，還是重彈老調。今年四月十日，錢其琛訪問貝爾格勒時，曾向南斯拉夫聯盟國會兩院外交政策委員會聯席會議發表演說，也是如出一轍的外交詞令。^⑩

其次，江澤民於七月十三日在波昂應德國外交政策協會和德國經濟亞太委員會之邀，以「闊步前進中的中國與世界」為題，發表演說。江氏除了闡述中共近年來搞「

註⑧ *Ibid.*

註⑨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版A2。

註⑩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一日，版A2。

改革與開放」的心路歷程外，對當前的世界情勢也提出一些看法。^①茲就其要點，列舉如下：

第一，在國際關係中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脅，或者採取強權政治的做法，不僅無助於爭端的解決，而且會導致衝突與戰火的擴大和蔓延。唯一正確的途徑是通過談判求得和平解決。

第二，當今世界，是一個正在走向多極化格局的世界。一兩個大國和大國集團主宰世界事務、支配其他國家命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每一個國家，無論大小、貧富、強弱，都是國際社會中平等的一員。各國主權範圍內的事情應當由各國自己去辦。世界事務應當由世界各國平等協商來解決。

第三，如果大家都能在國際交往中遵循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世界上就會減少許多矛盾和爭端，國與國的關係就能夠正常發展。相反，如果硬要去干涉別國事物，甚至企圖阻撓、破壞別國的統一和發展進程，最終總會事與願違，逃脫不了自己付出沉重代價的結局。

第四，隨著經濟往來和科技革命的飛速發展，地球似乎變小了。誰也不能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不能脫離世界科技進步的總進程和在世界大市場上互通有無。各國在經濟交往和全球及區域經濟合作中，應當平等互利、優勢互補、相互促進，而不能相互排斥，不應採取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或歧視性政策，更不應動輒採取制裁的做法。為了應付人類共同面臨的許多挑戰，要努力探索加強多邊、雙邊合作的新途徑和新方法，使之形成勢頭，並不斷推向前進。發達國家有責任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縮小南北差距。這不僅是實現共同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要求。

江氏除了指出中共對當今世界局勢的觀點外，同時也表明了北京政府當前的歐洲政策。江澤民說：「西歐是世界上經濟高度發達、政治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區，中國重視西歐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國和西歐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方面，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平等互利應當成為指導我們相互關係的原則和基礎。中國願意同西歐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加強磋商與對話，在經貿領域裡繼續擴大合作，共同發展面向廿一世紀的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我們真誠地希望西歐各國擴大在中國的投資和貿易，同時也希望西歐國家對中國進入西歐市場採取更加開放的態度。我們相信，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西歐發達國家之間在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必將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②

從以上江澤民的講話內容看來，顯得大言不慚，並且還多少學習戈巴契夫的「新政治思維」之論調，尚有一點吸引力。不過，江氏仍不忘利用這種公開場合施加恫嚇，來打壓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生存空間。他說：「今年春節前夕，我特別發表過八點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點，我曾經講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註①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五日，版A3。

註② 同註①。

。但是我也想說明，這裡面假使國際上有一種干預的勢力，非得要進行挑起我們的衝突，這個恐怕中國人也是不能答應的。」^③其實，江氏對台灣的霸權心態和製造緊張的陰謀，與他上述所云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馳，充分暴露了共產黨人言行不一的本質。

肆、江澤民歐洲之行的意義與成果

一、江氏訪問顯示的意義

中共當局對江澤民芬、匈、德三國的「國事訪問」，給予極高評價。不過，從某些面向觀之，不難看出江氏這次歐洲之行所顯示的意義。

首先，就外交上的意義而言：江澤民的芬、匈、德三國之行，除了表示禮貌性的回訪之外，還可藉此機會顯示，其有意拉攏歐洲貶低美國。中共刻意安排江澤民以第一位國家元首身分，分別訪問在北歐的芬蘭、在東歐的匈牙利，和在西歐的德國，一方面顯示其對歐洲「全方位」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藉公開場合的宣示，在中（共）美關係陷入低潮之際，來突顯「中國與歐洲」互利互補的重要性。

其次，就經濟上的意義而言，江氏此行擺明的是經濟利益掛帥，從他此行的陪同人員看來，除了外交部長外，還有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吳儀，和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曾培炎，可見其著眼點擺在經濟領域。顯然地，北京當局企圖以經濟利益為誘餌，來擴大其歐洲的影響力，不僅可藉經濟利益有效地堵住人權問題的困擾，而且也等於公開宣示，「過分關心中國大陸人權問題者，無糖吃」，得不到垂手可得的好處。

再其次，就政治上的意義而言，無可置疑，江氏此行除了顯示其從鄧小平順利接班，領導權力鞏固，提升其國際聲望，具有宣示性意義外，他還乘機宣傳「一個中國」政策，如他在匈、德的公開場合，都讚揚布達佩斯和波昂政府遵循「一個中國」政策，企圖封殺台灣在國際社會的活動空間。

此外，江澤民仍然揮不掉迫害人權惡名昭彰的陰影。儘管中共試圖以經濟利益引誘工業先進國家就範，不談人權問題。但芬蘭總統阿赫蒂薩里、德國總統赫爾佐格和總理柯爾，還是關切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或明或暗提出一份異議份子名單，請求中共當局從寬處理，予以釋放。^④再者，芬、匈、德三國自由報業也廣為披露人權活動家吳弘達被補，魏京生無故失蹤多時等消息，對中共迫害人權問題，大加撻伐。^⑤

準此以觀，江澤民此次的歐洲之行，即使中共刻意凸出北京與歐洲的關係，但還是不難看出，其經濟上的意義大於政治上的意義；即使中共也試圖提升其對歐洲的影響力，但北京當局蔑視人權，實行「一黨專政」，與具有自由民主傳統的歐洲，仍然是格格不入，因此，其外交上的象徵性意義大於實質性意義。

註③ 同註①。

註④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八日，版九。

註⑤ 同註⑦。

二、歐洲之行的成果

究竟江澤民這次芬、匈、德三國之行，有何斬獲？自然也是媒體和國際社會所關注。茲就外交、政治和經濟等三方面，概述如下：

首先，就外交關係方面來說：江澤民此行除了有意促進相互間的瞭解與合作外，中共和芬蘭簽署了「有關互設領事機構的換文」，芬蘭得在上海增設總領事館，中共則可保留在芬蘭增設總領事館的權利；^⑩同時，中共和德國簽署了「有關互設領事機構協定」，雙方同意在廣州和慕尼黑互設總領事館。^⑪此外，芬蘭總統接受邀請，訂明（一九九六）年四月訪問中國大陸，德國總理柯爾也將在金秋第四度訪問北京。

其次，就政治方面來看：對江澤民個人而言，無疑地，他藉此次歐洲之行，可提高其在國際社會的聲望，並可藉此強化其領導地位。就中共的對外關係而言，重彈「一個中國」、「一國兩制」老調，或多或少可產生威懾作用，牽制台灣務實外交的努力。

再其次，就經濟方面來看：無疑地，江澤民此次歐洲三國之行的重要任務，還是擺在經濟領域，尤其是加強對德國的經濟合作。從中共所簽訂的相關文件，即為明證。中共與芬蘭簽訂了六個經貿協議、合同和意向書，總金額約九千三百萬美元。^⑫其中最受各方矚目者，則是中共和德國共簽訂了一個財政合作協定及八項合同，^⑬即是：

* 中（共）德財政合作協定：根據這一協定，德國政府將在本年度內向中國提供一點三億美元的財政援助。

* 中共「中國銀行」和德國「德累斯頓銀行」（Dresdner Bank）簽署了一項信貸總協議：根據協議，德累斯頓銀行將向「中國銀行」提供價值七點一億多美元的信貸。

* 中共南方汽車公司和德國賓士公司簽署了「關於生產多用途汽車合資項目可行性研究原則協議」：這個項目涉及十億美元，計畫中的合資企業可年產六萬輛高級麵包車和十萬部發動機。賓士公司占百分之四十五，南方汽車公司占百分之五十五。

* 「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上海電力局和德國西門子公司關於楊樹浦電廠改造合同。

* 上海中聯電子公司和博施（Bosch）公司關於電子噴油系統合資合同。

* 北京液壓工業公司和德國曼內斯曼——力士樂（Mannesmann AG）公司合資合同。

* 「中國第一汽車製造廠」和德國「保持捷」（Porsche AG）公司研究開發中心合資意向書。

* 「中國機械進出口總公司」與德國勒德（Lode AG）公司關於貴州安順水廠設

註⑩ 國防部情報局編，中共廣播輯要（台北），一九九五年七月七日，頁廣十八。

註⑪ *Süddeutsche Zeitung*, July 14, 1995, pp. 1~2。

註⑫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五年七月七日，版十二。

註⑬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四日，版A2。

備合同。

*「中國機械進出口總公司」與德國普羅伊薩格（Preussag AG）公司關於貴州遵義水廠設備的合同。

由以上的合同觀之，德國可算是經濟利益和外交利益名利雙收最大贏家，不但有助德國統一後經濟的復甦，而且也提升德國在國際社會的威望，離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腳步愈近，並對亞洲的影響力也會增強。再者，中共和德國加強政經關係，形成戰略合作伙伴，彼此都試圖在國際社會展現實力。

伍、結 論

綜觀江澤民此次歐洲三國之行，其可能發展或影響，也頗值評估：

第一，在後鄧小平時期，江澤民圖謀有所作為，以擺脫鄧小平陰影。江澤民這次德國之行，引進大批外資和技術，有助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加速其現代化腳步。同時，江氏出訪歐洲，增廣見聞，多少也能體會到西方國家對人權的尊重。據傳，鄧小平死後，江澤民爲了收攬民心，很可能對「六四天安門事件」予以重新評價，以改善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因爲，中共當局不能完全漠視人權問題，若想充當泱泱大國角色，就得要接受國際人權規範和行爲準則。

第二，歐洲聯盟在國際的發言地位舉足輕重，中共加強對歐關係符合其國家利益。中國有龐大市場，近幾年來經濟增長快速，對歐洲各國都甚具吸引力，均有意與中共加強關係，俾可分享這塊大餅，無意追隨美國路線。在江澤民出訪歐洲之際，歐洲聯盟同時發表「新中國政策」，企盼將中共政權導入國際主流，經由加強政經關係以促成其改變，顯示與美國的對華政策有所區別。

第三，中（共）美之間的互動關係雖有障礙，但基於各自利益，不致於惡化或形成對抗。很明顯地，華府基於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的考量，仍然必須與北京打交道，維持正常化關係，沒有理由去推動北京當局一再宣傳的「新圍堵政策」。不過，人權問題與經濟利益孰優孰後，使華府陷入苦思，如何尋找到一個平衡點，兩全其美，頗費周章，沒有標準答案。再者，中共利用「吳弘達事件」，和向歐洲「輸送」經濟利益，來打擊美國，籌碼也有其局限。畢竟中共與美國貿易額占其對外貿易將近五分之一，一九九四年順差高達二百九十五億美元，²⁰獲益多多，不易難倒美國，而使雙方關係倒退。

最後，尚值得一提者，江澤民此次歐洲之行，無疑地，多少會牽制我國在歐洲的活動空間，使台北與歐洲各國的互動關係，僅能維持現狀。無可諱言，北京當局企圖處處打壓我國在國際社會的生存空間，對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毫無裨益，反而徒增猜疑。

*

*

*

註²⁰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版七。